



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 杨念群 主编

穿蓝色长袍 的国度

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

〔英〕阿绮波德·立德 (Archibald Little) 著

刘云浩 王成东 译



中华书局

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 杨念群 主编

1561.64

3

2006

〔英〕阿奇波德·立德 (Archibald Little) 著

刘云浩 王成东 译

穿蓝色长袍 的国度

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英)阿绮波德·立德著;刘云浩,
王成东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西方的中国形象/黄兴涛,杨念群主编)

ISBN 7-101-05005-0

I. 穿… II. ①立…②刘…③王… III. 游记 -
作品集 - 英国 - 近代 IV. 1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7606 号

-
- | | |
|-------|--|
| 书 名 |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
| 书名原文 | The Land of the Blue Gown |
| 著 者 | 〔英〕阿绮波德·立德 |
| 译 者 | 刘云浩 王成东 |
| 丛 书 名 | 西方的中国形象 |
| 主 编 | 黄兴涛 杨念群 |
| 责任编辑 | 张彩梅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34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5005-0/K·2177 |
| 定 价 | 16.00 元 |
-

“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总序

二十余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

的内容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廷所雇佣的外国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西方报刊派驻中国以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探险家、律师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等等,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非同时期有机会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中西直接接触和中国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故此对于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

“块垒”。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仍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就曾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参见本丛书中《中国变色龙》一书)。其实,并非只是中国自身在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想象,也在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然而从18世纪末期起,由于种种因缘,这一正面形象却迅速地朝其反面转化。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本译丛所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段。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并由此易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阅读那个屈辱时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著述里常见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时,我们其实已不必过于敏感,更不必有意加以回避。正如本丛书最早出版之时戴逸先生赐序所指出的:这些偏见和歧视,“只能彰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

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不损。我们已有足够的肚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近代西方那极不美妙的中国形象之中的有关认识总体上较之以往趋于深化,至少这种形象变化成为其认知中国走向深化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因为毕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要远比以前更为密切、交往更深、观察更细、碰撞也更多。实际上,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变化了的形象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不会不正视和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西方汉学家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这已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乃刘东教授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论著,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有益的借镜。而我们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则显然属于另一类。它主要选择 19 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

生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的故事、政治制度的运行等轻松活泼、凸显感性、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类著述。我们的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较广泛地流传，对西方的“中国观”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作者在华经历丰富、际遇独特、观察细腻、眼光独到、议论有味，总之具体真切、形象生动。与此同时，丛书还将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我们认为，后一类译著的价值，当是前一类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本译丛最早筹划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7年至1999年间，它曾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为名，由时事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推出过十种，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但此后，终因我们精力不济，未能继续编译下去。多年来，虽屡有朋友鼓动、多家出版社诚恳相邀，我们却始终畏葸不前、未敢轻允。2004年底，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李晨光、马燕、孙文颖等郑重来函，希望我们能将此套译丛改在中华书局出版，争取每年推出三至五种，持续不断地长期编译下去。书局的领导对此也很支持，意在使之成为一项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工程”。经多次商谈，我们终于又在这个文化人“情有独钟”的老牌出版社的召唤之下重鼓余勇，再次投身到此套译丛的编译事业中来。

由于原来所出版的十种书分散在两个出版社，且早已绝版，有的译校也尚欠精审，故此次在推出新译之前，在汉学编辑室上述几位专业编辑的大力协助之下，各译者又对原译著进行了认真的校审或修订，并首次以十部汇齐的完整形式，

将其予以重版。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希望此举能为译丛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较为牢靠的基础。

但愿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对于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认知西方人当时的中国观,能够多有助益,并在今后“持之以恒”的坚持中,真正成为编者、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共同喜爱的学术文化事业。

黄兴涛 杨念群

2006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目 录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01	一访北京：围城之前	1
02	引航镇：大沽	10
03	八月在烟台	15
04	上海的城墙	21
05	上海	26
06	中国农村	35
07	宁波的春天	41
08	九月在芜湖	54
09	宜昌——龙王洞和龙丘	59
10	丰都：中国的冥府	66
11	报酬微薄的传教士	71
12	距上海一千五百英里的农村 ...	82
13	中国西部的反洋人暴动	133
14	对进一步暴乱的警惕	143
15	“坏”温塘	151

16	四川边境的部落·····	157
17	餐桌的布置·····	169
18	传教士在做什么? ·····	172
19	反对裹脚之行(一) ·····	181
20	反对裹脚之行(二) ·····	196
	译后记 ·····	213

01 / 一访北京：围城之前

从北京回到天津，我就一直认为，在所有我到过的地方中，北京是最奇妙的。回到天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新修的铁路和火车头。同欧洲相比，这铁路和火车头只能算小孩的玩意儿，但仍使我们感到恍若穿越了好几个世纪。要知道，三天前我们还骑着马儿颠出北京城。天津，尖利的汽笛声中，铁匠们在打铁，水兵们赶着马和驴走在英国式的河堤上。领事馆门外，真真切切地停着一艘飘扬着英国皇家海军快艇中队舰旗的军舰。三天前，我们用褐色的双峰骆驼驮着行李离开北京城时，每次呼吸都让人感到那是不讲公共卫生的时代。在北京，除了新近在大多数城门外设置的化粪池外，几乎没有别的公共卫生设施，更不用说下水道了。虽然气味让人怀疑北京到底是城市还是乡村，但化粪池本身作为公共卫生设施的新成果，已经很让人欣慰了。

伦敦以及充斥伦敦的新玩意儿——美学、卫生学、社会经

济学,使我十分厌烦。对那些与我有同感的人来说,去北京旅行是最令人振作的了。治病良药奎宁,吃起来很苦的,北京也是这样。阳光下熠熠闪光的皇家楼阁的琉璃瓦,在汉白玉桥周围,甚至在煤山上都能看得到。除此之外,北京还有许多令人为之振奋的东西:牌楼、小亭儿、明净的空气——在这明净的空气里,泥墙也很美。牌楼上盘着威严的金龙,深蓝色、鲜绿色与朱红色搭配得十分和谐。几百年来,中国妇女们都穿着在西方只有男人才穿的长裤;她们穿旗袍而不穿裙子。我们混迹在这些最安分的人群中,他们如此顺从,随时准备为乘坐八抬大轿的官员和骑马的侍卫让路。

我们乘船沿着白河缓缓地顺流逆风而行,同船的是一位候补道台和他的随从。道台双颊灰白,一个劲地吸烟,毫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一言不发。无论怎么看,在那个世代承袭的显贵家族中,他都是最虚弱的子孙。我们提醒自己,与我们同行的是一位官员,一位等待任命的官员。

人们通常只看事物的表面,而我们连北京大考场的外表都还没有看到。三年一次的全国科举考试就在这个考场中进行。中国的男人们在考试中追求最高的功名,成功者的名字将被刻在大石碑上,永远供后人瞻仰。

中国最奇特的事物之一就是这种考场。虽然它仍然是中国最出色的男人们赢得功名的地方,但这种考场给人的冷落和遗弃感,要远甚于意大利的古罗马遗迹。在意大利,走进异教的庙宇,尽管已经几个世纪没有举行宗教仪式了,但与中国的庙宇相比,更像是宗教仪式一直没有断过。北京的庙宇中,现

在，至少在围城之前，每年要举行两次盛大的仪式。就我所知，阿波罗和丘庇特在欧洲受到的待遇要比释迦牟尼和观音菩萨在中国高得多。此前，在中国其他地方，我都没有见过哪怕是极小规模宗教仪式。

也许，中国人仍然信奉佛教、儒教或道教。在中国住了几个月之后，我对此观点的信任度大大下降了。在中国，除了庙宇和神像之外，没有太多宗教的痕迹。如果庙宇和神像就是宗教，古罗马就是多宗教国家了。我在伦敦时曾给外国人做过导游，参观过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前英国国会所在地。英国国会分长老院〔也称上院〕和平民院〔也称下院〕）。我们去平民院时，祈祷还没有结束，议员们正在祈祷。外国客人中没有基督徒，但祈祷的庄重和肃穆还是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一位活泼的德国女游客悄悄地问：“能用小望远镜看一看这些漂亮的建筑吗？”在孔庙里，谁会因为使用一个小望远镜而犹豫呢？之后我们去参观长老院，但连往里看一眼都办不到，因为议院的长老（议员）们还没有做祈祷。一位警察说，祈祷结束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往里看。“每天都这样做祈祷吗？每天？”一位瑞典教授严肃地问道，“如果是的话，我不得不说，英国是一个奇妙的国家。”

最使我惊奇的是中国人对法规的漠视，这一点在旅居中国的欧洲人身上也滋长起来了，充分地表明了这种漠视多么符合人的本性。例如，在中国，我听到一位西方妇女说她星期天去野餐了。我一生主要是在国外度过的，但直到来到中国，我才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在这里，星期天去野餐成

了惯例而不是例外。她们争辩说：“星期天是休息放松的日子。”在烟雾弥漫的利物浦或伦敦，这句话会更有力量。文明世界里，哪个欧洲人的教堂像在中国的那样人迹罕至？我经常想起一位海关检查官的话：“与其说是英国人在努力使中国人信奉基督教，不如说是中国人更多地让英国人放弃了基督教。”面对大车店一样住着各色人等的北京，我在想，这难以捉摸的影响力到底是什么？它征服了曾经的征服者——满族人。一眼看去，一切都那么令人无可奈何地感到格格不入和反感，北京现在的状态简直是一个可怕的榜样。

有人说中国人不关心别的，只关心钱；中国人不讨论别的，只讨论钱。这能解释一切吗？到现在为止，我还无法看出，除了钱之外，欧洲人还想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些什么。那些被派去教导中国人“爱钱是万恶之源”的传教士，看来也大多具备着对钱的嗜好。

北京有很多迷人的花园。我们路过的时候，花园里鲜花盛开，每个从花园出来的人，手上都拿满了晚香玉花。前门（也是正门）周围弥漫着香味，它来自一排排等待出售的小树。中国人欣赏花似乎只是为了花香，他们只喜欢香味浓郁的花。中国人十分幸运，他们的嗅觉器官只能对引起愉悦的气味起反应，对那些使人不快的气味，他们似乎懒得挪动他们的鼻子。

从城墙上看，北京像个大公园而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城里到处是树。许多宫殿前都有一排排郁郁葱葱的树，每个院子里至少有一棵，大的庭院则几乎栽满了树。事实上，如果北京是像它规划的那样——或许它曾经就是那样——我想

不出有比北京更雄伟的城市。北京城的总体规划规模宏大,特别是站在钟楼往鼓楼或站在鼓楼往钟楼看,其透视和比例的安排极佳,既有距离感又注重细节。钟楼上有个阳台,本身并不很出色,但从布局看,是我所见过最壮观的阳台。在英国人尤其欠缺的方面,蒙古人确实非常出色。我们的法院和新帝国学院的选址,忽必烈大汗是永远不会批准的。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规划得比北京更宏伟,它的骨架庞大而壮观。作为历史的遗物,北京城引人入胜。在我们看来,大人物往往住在庄严的宫殿里,他们触手可及的是豪华而不是舒适。他们很少想到外出,即使外出,也带着一排排的侍卫。侍卫们把平民百姓赶开,惟恐他们的呼吸玷污了大人物的尊严。能够想象,一些心地善良的妇女或思想开放的年轻人从他们的轿子里,或从马车的帘子间,带着极大的同情和遗憾看一眼这些平民百姓。这些老百姓,肢体不全,身上长着疮,衣衫破烂仅能勉强蔽体,却用他们的保守和落后去抵制任何改变他们处境的努力。北京的街道上似乎到处都是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有些也许是大人物的食客,他们随时准备与人吵嘴和打架。那些娇贵的大人物,院子里种满了树,在能遮风挡雨的大庭院中,他们的怜悯很快就会消失,变为厌恶和无动于衷。有时,街上的马车里会有一两个满族妇女,她们面目清秀,脸上挂着和善的微笑。她们善良、安详,兴致很高地看着这个城市和它的道路,就像中世纪或世界历史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人物一样。

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忽必烈大汗和他的继承人是否曾经让这个城市很清洁,或者说适当地管理过这个城市。但是,北

京城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遗憾：构思完美、规模宏大的北京城竟然如此破旧。



皇宫入口

回通州的路，我的遗憾变成愤慨甚至愤怒。通州的大街凌乱不堪，到处是垃圾，路面印满了杂乱的车辙。马车走在大街上颠个不停，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马和骡子在前面吃力地拉，后面推车的汉子光着上身，古铜色的强壮身躯俯在车轮上竭力地推。年复一年，他们就这样拼命、挣扎，把沉重的马车从本不该存在的车辙中推出来。强壮甚至有些野蛮的人们在做这么简单而原始的工作，真令人悲哀。没有人怀疑体力劳动的高尚，但体力劳动应当用于恰当的用途，而不是无谓地消耗。通州的路该修了，路修好了，这些人和他们的马、骡子与现在一